

臺灣人類學方法論知識的來源——

讀《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 廖經庭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

與知識建構

郭佩宜、王宏仁主編

巨流 / 9502 / 350元 / 平裝

ISBN 9577322476

人類學最重要的學科特色即為進入田野現場進行調查研究，自從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倡導「參與觀察法」走到田野進入實地調查後，人類學從只靠二手資料進行研究的「搖椅上的人類學家」，蛻變為極為強調實地的田野調查工作。換言之，田野調查工作可說是初學者跨進人類學者的「成年禮」儀式，若未曾進行過田野調查工作，則其人類學者的正統性，將受到嚴厲的挑戰與質疑。

過去臺灣人類學界研究方法的經驗與田野調查的反思大多來自歐美學者，例如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Levi-Strauss）於1950年代出版《憂鬱的熱帶》便是田野經驗書寫的經典之作，可惜臺灣人類學界田野經驗的相關書寫之作仍不多見，本書集結臺灣人類學界年輕學者，將各自的田野調查經驗論述出

來，並思考田野經驗對研究者的意義（頁 viii）。

本書除導論外，共分為四部，第一部「進入田野跌一跤」的兩位作者為林開忠與張雯勤，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所教授林開忠的田野地點是馬來西亞砂勞越，長途跋涉到偏遠的砂勞越進行學術研究調查，結果卻被馬來西亞政治部盯上、跟蹤，這個部門是管控政治的問題，乃是英國殖民者所遺留下來（頁14）。來到田野地點的林開忠被政治部人員跟蹤，政治部人員刻意住在他旅館隔壁房，故意開啓收音機並放大聲量，透露出「你被監視了」的訊息（頁 23），林開忠便在生命安全和恐懼交迫的情況之下，艱辛的完成這次的田野調查。張雯勤以落居於泰北的中國人作為研究個案，這群人便是臺灣報導的「忠貞的泰北孤軍」，因進入泰國研究需向泰國國家研究機構提出申請，在清邁大學 Bhansoon 教授的協助下她得以走訪雲南移民的據點，但張雯勤臺灣國民的身分卻讓泰國政府產生遲疑，計畫審查人擔心她的研究（或者應該說張雯勤的臺灣身分）會影響中國大陸與泰國的關係（頁 44），向泰國內政部做最後諮詢的結



果，她的田野調查工作可能隨時停止，所幸在泰國多位教授的協助之下，寄出多封解釋信件，獲得泰國政府的「瞭解」與「諒解」之後，張雯勤的田野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

第二部「田野尷尬——從文化包袱到文化體悟」囊括郭佩宜、王宏仁與趙綺芳等人的文章，這些作者檢視在本身文化的浸淫之下，自我文化與田野文化的衝突馬上顯見。郭佩宜的田野地點為座落於大洋洲的一個小族——所羅門群島的 Langalanga 人，Langalanga 人的膚色較黑，較少看到白種人與黃種人至該地，膚色的不同讓研究者在田野地點註定與眾不同。王宏仁在越南的臺商研究上也碰到文化衝擊與想像的落差，第一次出國做田野調查的研究者，其實跟觀光客沒什麼太大差別，而且為讓訪談能順利進行，偶爾也許說出一些口是心非但無傷大雅的話，研究過程甚至也需贈送一些紅包給受訪者。換言之，對研究者而言，田野調查工作似乎充滿著矛盾與衝擊，在不同的田野時期、不同的社會位置，便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與視角，也會有不同的意義（頁 112）。趙綺芳以沖繩竹富島為田野地點，竹富島民對外來者的觀感影響著研究者研究的進行，竹富島民對外來者通常保持距離甚至視而不見，而人類學衡量是否順利進入田野的指標——有無被收養（adopted），趙綺芳也未被出租房間的老爺爺收養，田野初期無所歸屬的感覺讓研究者印象深刻（頁 125），趙綺芳在田野地點也感受到日本文化的男女差異，竹富島女性需端正地跪坐，即使全身痠痛，也需等到大人物（尤其是男性）離去，才敢伸直雙腳（頁 132），趙綺芳雖未學會長時間跪坐，但人類學強調學會當地語言時，鑲嵌於日本

文化特色之內的跪坐「身體語言」，卻也讓她感受到跪坐對她而言比語言學習更為困難。

第三部「田野非常政治」，莊雅仲、容邵武、龔宜君與顧坤惠等作者。莊雅仲研究臺北市社區組織的研究，莊雅仲進入社區發展協會工作並進行研究，在田野現場莊雅仲與另兩位同事的人際關係互動，既是合夥關係但也經常衝突（頁 165）。容邵武的田野經驗可算最具「災難」性，他選擇臺灣中部客家莊——東勢為田野地點，欲探討法律如何在地方上運作，然而東勢鎮民卻認為如果只研究法律現象，那就只注意到一個環節，應從語言、習俗、歌謠等民俗著手，才能與生活串連在一起（頁 179），在受訪者過於熱心之下，研究者的研究主題與問題意識經常受到受訪者的「質疑」。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發生「集集大地震」，東勢受到嚴重的傷害，上百人罹難，上千棟房屋倒塌，而容邵武的田野筆記與文件也損失不輕，歷經百年大地震後，容邵武的研究位置也必須重新調整（頁 181）。龔宜君在取得博士學位後，進入中研院轉向東南亞研究，到了田野現場時受訪者經常試探龔宜君的政治立場（頁 205），因此龔宜君通常顧左右而言他，避免產生「錯誤」回答。若從資本主義的角度而言，臺商的結構位置是資本家，他的立場是要獲利，要有利潤就得剝削工人，以這種角度而言，臺商似乎是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但真正貼近臺商異地求生存的奮鬥過程後才能真正了解臺商，臺商在面對不那麼愛賺錢的異族群勞工時，就必須透過一些「撇步」管理，以賺錢為目的的考量下，工人的權益與

福利通常是被壓制的（頁 214）。顧坤惠以臺灣的排灣族為研究對象，一位村民建議給她一個排灣族的名字「Muni」，後來才知道這原來是貴族的名字，只有貴族家系的長嗣才可命名，與研究對象熟稔後，一位名為普攸瑪的貴族女性同意賜予她這個名字，對排灣族而言，命名的正當性，是跟賜名者與其家屋的位置關係密切，這對田野工作的進行而言非常重要（頁 222）。

第四部「田野和生命的協奏曲」具有女性氣質的細膩筆觸，邱韻芳與林秀幸從田野經驗探討其與個人生命歷程的關係。邱韻芳以花蓮Truku人為研究對象，在 Truku 正名運動當中，不同地區、階級與生活經驗的族人有著相異的看法，邱韻芳卻被「根本賦予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所吸引（頁 264）。在進行田野工作時，邱韻芳父親竟罹患癌症，一連串混亂的日子中她陪著父親做各項檢查、化療，父親依舊日益消瘦，然後突然病情惡化離開人世（頁 269）。離開田野地點後，不久邱韻芳又接到來自花蓮的電話，原來是進行田野的住宿家庭發生不幸，他們的兒子——雅各被發現倒臥在路旁沒有氣息，接到噩耗邱韻芳隨即趕到花蓮送雅各最後一程（頁 272-273）。人們只有親身經歷失去親密的人後，才能感受那種最深切的哀痛。林秀幸先在中臺灣一個小鄉鎮——鹿港進行調查研究（頁 286），隨後又在新竹縣客家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在儀式過程中林秀幸感受到自己與祖先的神會，那是一種超出理性與感性的對立（頁 298）。

本書的重點已如上所述，多位作者細心將自己的田野經驗抽絲剝繭，他們出版的學術論文已展現各地族群人類學民族誌觀察與

分析，藉由本書也使得讀者能夠在學術界生產的學術論文外，真正進入田野研究者的內心世界，感受他們在田野現場的衝擊與悸動。閱讀此書後，筆者也有感而發激盪出幾項心得與淺見：首先，本書為臺灣人類學界的研究方法論開創一個可能性，人類學是外來的學科，今日臺灣人類學知識體系，從進化論、傳播論、結構功能論、結構人類學、儀式與象徵乃至於詮釋人類學等知識體系都自西方世界而來，而且人類學者對自我田野經驗的反省也大多以西方學者為主，例如上述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與奈吉爾·巴利（Nigel Barley）的《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等，集合臺灣人類學界年輕學者將自身的田野經驗紀錄進而反思，的確開創人類學研究方法論本土化的可能性。

其次，本書共有十一位作者，每位作者有各自不同的求學、田野與生長經驗，彼此的寫作風格與文筆繁簡不一，因此讀者每次閱讀下一篇時，可能產生不熟悉作者寫作風格而無法盡探作者意思之憾，所幸本書的兩位主編——郭佩宜與王宏仁早已為讀者考慮作者們寫作風格可能不盡相同的情況，故在書後以對話的方式對本書進行簡單的「補讀」（頁 xviii），有助於讀者更清楚了解每位作者所欲表達的田野經驗與研究反思。

本書是一田野指南的著作，但絕非僅是一本關乎田野技術的手冊，多位作者透過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等三者共構，對自身的田野調查經驗細心檢視與反省，不僅是田野知識建構之作，更是作者們自我追尋成長的歷程。本書豐富的田野經驗實例與自我反思，值得讀者們仔細品讀。